

第一部分

从书香子弟到共产党员

不幸的我，来到世上 15 年才见到父亲，有幸的我，从幼年到少年与父亲一样生活在故乡。

因而，我了解莘莘学子时代的父亲，我与父亲同样体味着家族的影响。

■ 1. 唐家桥新屋

1904 年 4 月 30 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父亲——任弼时诞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今弼时镇）任氏“新屋”。这里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平原区的东南，

汨罗江南岸，距汨罗市 30 余公里，距湘阴 40 余公里，是典型的洞庭水乡。

“新屋”东倚葱葱茏茏的颖珠山，西望蓊蓊郁郁的明月山，脚下是片片碧绿的稻田，屋前不远即是波光潋潋的白沙河。白沙河自北向南缓缓流淌，入捞刀河，再汇湘江。白沙河在此地原有一桥，名曰“唐家桥”，后塌坏。在此，曾设有以“唐家桥”为名的驿站。以后驿道废弃，驿站改为邮政代办所，这一带便也以“唐家桥”为名沿用下来。

“新屋”是很典型的湖南乡间旺族宅院的结构。

走进头门楼，最醒目的是一亩方塘和塘周亭亭玉立的秀竹、遒劲挺拔的古松。其间一株合抱粗的松树体态竟似黄山迎客松，将根深深地扎在塘边泥土中，却将全身探向水面，苍翠如盖，倒映水中，为小径环塘翠竹绕墙的清秀平添了伟岸与凝重。

隔塘举目，即是砖木结构的“新屋”主体。青砖灰瓦，条石为基。

“新屋”分三进，一进堂屋与二进堂屋之间有一较大的天井，东西各植一树；三进堂屋最大，东西各有一天井，天井中间砌有石台，常有盆花点缀其上。

东西厢房并不对称。三进堂屋的东面，另接一很大的堂屋，并另有厢房。

家族的各个家庭分居各个厢房。全部住屋均有回廊相通，檐下砖砌的排水明沟整齐有序。

父亲的诞生给时年 34 岁的祖父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听奶奶说，我原有一个大伯，叫大刚，不幸儿时夭折，给祖父打击颇大。今天，又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来到世上，那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按族谱，他给儿子取名“培国”，取“培植为国人才”之意；取号“二南”，我想大约是“二男”的谐音，既纪念早亡的长子，又说明了父亲是男孩。

其实“新屋”到父亲这一代早已不新，只因当年盖屋时称为“新屋”以后就沿袭下来。据老人们说，我家祖上是江西吉水人，元朝初，从江西迁至湖南，先定居长沙一带，三代后又迁至湘阴县境。大约是父亲未出五服的曾祖 19 世祖寄园公在唐家桥建此“新屋”。

屋，是老屋；家族，也曾是“望族”。

寄园公曾作朝议大夫（从四品）后晋增资政大夫（正二品）。这些官位都只是一种表示地位身份的称号，并没有实际职掌，为“散官”。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

寄园公有四子，长子早夭，只有次子星洲公同治年间曾任广西太平府知府。其他祖上多为文散

官。因之家族读书氛围颇具传统。

至父亲的祖父这一代，已进 19 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腐败，统治已逐渐走向衰亡。但是与家族官位称号逐辈下降相反，整个家族子辈奋发求学，大步追赶社会前进的步伐却日渐加快。

祖父这一辈，五服以内除早夭者外，兄弟姐妹共 20 人。都是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中有的赶上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尾巴，也曾参考过，但未中。随即便在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纷纷投考新式师范学校，年龄大的便插入速成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代人，男子 60% 以上离家或赴县城，或赴省城就读，女子在省城受中等教育的也近 30%。更有不但走出了家门、县门、省门，并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家、学者、工程师。

任企虞，父亲的堂叔，辈名裕泰，原名奏南，号丽储。我们都称他企叔公。企叔公和黄兴有亲戚关系，很熟悉，黄兴的堂妹是他的三弟媳。辛亥革命前，他即参加了黄兴筹组的秘密革命组织。他们目睹清廷腐败，国势衰微，认为改造社会，必先从普及基层教育着手，以启发民智，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并决定首先由黄兴在家乡筹措资金创办黄氏第一女校作为先导。企叔公随即响应，卖地兴学。把他母亲平时代为积蓄购置的个人田产尽行变卖，以

换得教学设备，并利用祖宅厅堂为教室，创办求志学堂。免费招收邻近戚友子弟，影响颇大。后因就学者数量大增，教室不够。于是，他又动员任氏族长出售宗祠积谷创办族学“序贤学堂”，并劝导本乡殷实人家捐助经费，设立乡学“同德学校”广为招收乡里子弟，促使近乡就学风气大开。因办学优异，不久，企叔公被派北上远赴吉林省办理长春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企叔公返回长沙，襄助其表兄办理自治女子职业学校，并兼授文史课程达十余年。企叔公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不求闻达，不计个人得失，旨在为国育才，不但培育了任氏家族众多子弟，更为乡里、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

任凯南，父亲的堂叔，家族中又一位毕生献身教育的人，有名的经济学家。

凯叔公，辈名裕恒，号拱辰。曾考科举，获拔贡等功名，后入岳麓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1911年，与几位友好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5年考取公费留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学士学位，1921年学成回国。为纪念岳麓书院历来培育湖南人才的伟大贡献，凯叔公即与好友数人，创办私立大麓中学，与私立明德、广益、周南等中学比邻。不久，又兼任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馆长。

1926年1月，湖南省工、商、法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成立省立湖南大学，凯叔公任湖大首任校长。1928年7月，武汉大学筹立，即转往武大任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以儒家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观点，融会贯通，成经济史学的一家之言。在经济学界曾与马寅初齐名，有“南任北马”之称。

凯叔公一生尽瘁教育事业，对大麓中学及武大、湖大的建设锲而不舍，成为后辈楷模。

任理卿，辈名裕敬，名尚武。是只比父亲大9岁的小叔公。“五四”时期，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较普遍地想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想到西方和日本找经验，振兴中华。理叔公抱着工业救国、实业救国之念，在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专科学校学习，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后又赴美国南部 N·C 学院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成为我国一代知名纺织工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纺织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一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等职。

.....

我祖父辈名裕道，名思度、扬烈，字振声，长企叔公两岁。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即在族中开

设蒙学“时中馆”，被亲朋视为“名师”。

19世纪末，谭嗣同等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筹办新学“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带来时代气息，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纷纷改革书院章程，并有计划地创办新的学堂。

1902年清政府亦下诏，改变学校制度，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为扩大学校教育，急需大批师资。各师范学校纷纷开设速成师范班。

祖父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乡村教师，在这一形势下，也赶往湘阴师范速成班学习。毕业归来，正值祖宅创设求志学堂，即被礼聘，任国文教员。从此，祖父一直在家乡作民小学、族学序贤小学等校任教，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终其一生。

2. 随父课读

父亲3岁多，月姑出生了。此后不久，祖父即开始了对儿子的文化启蒙。听奶奶讲，父亲4岁时，爷爷开始教他描红写字。他人小，个矮，登上

小竹椅才勉强够到桌面。再大一点就教他临帖，抄古文名篇：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原道》等。尽管当时尚不能完全解其意，甚至许多字都不认识，但幼时练字这是必要的一课，对陶冶父亲的沉毅性格，启迪父亲内在的绘画、音乐等素质，其影响是深远的。

5岁那年，爷爷到离家10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惟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于是，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白天，爷爷进课堂，爸爸也随着进教室。爷爷讲什么，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爷爷批改学生作业，爸爸围前围后，描红习字，爷爷从旁指点；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

毕竟爸爸还太小，闲时，祖父也常带领爸爸到田畴小径、竹下河边散步嬉戏，游水捉鱼。当然讲故事，背诵名诗名句，自是少不了的，屈子悲投汨罗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发生在故乡周围的历史上，而琅琅上口的《木兰辞》，直到父亲晚年重病之中还伏案抄录。

就这样，父亲7岁该当正式入小学一年级读书时，却已获得了作民小学颁发的修业文凭。文凭记

载着对父亲的评语：

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为发给修
业文凭事照得本学堂现届初等第四班第三
学年考试完毕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
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秀相应发给
修业文凭须至文凭者本学生现年七岁系长
沙府湘阴县人曾祖宣甲祖兆均父思度
右给学生任培国
堂长

黄帝纪元四六零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1914年，父亲正式入作民小学读书又两年。时族学序贤学校扩建完工，爷爷被族人再聘到族学任教。父亲又随爷爷来到序贤，铭鼎叔 1985年回忆道：“弼时到序贤来读书的时候，叫二南，又名培国。1914年上期，他父亲振声一叔来序贤任教，带他一同来读书的。这我还比较记得清楚。我们是全校师生排队站在新教学楼前，迎接他的父亲。”

父亲在序贤一直读到初小毕业。

序贤学校，原名“序贤学堂”，占任氏宗祠一间屋作教室，只一位先生，40名学生，规模很小。

任氏祠堂以前叫佛同寺。祠堂左右两隔壁的房子都是佛菩萨和观音菩萨，大大小小的木偶像很多。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皇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通过各种媒介逐渐传播，破除迷信，争取民权，办实业，兴科学，成为时尚。塾塘乡间最突出的就是改革教育，大办新式学校，启发民智，培养人才。

在绍霖堂叔公的号召下，召开全族大会，经一致赞同，1912年下半年开始毁菩萨，挖地基，扩建校舍。那年冬天“同学们烤火取暖是劈菩萨烧”，漆烧起来出油，有同学说：“烧得菩萨出汗”。扩建后的序贤，教室增多，新添了膳堂、宿舍和事务室，扩大招生，增聘教师。为筹措办校资金族内多年停止了“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把相当多的宗祠及支祠收入的租谷改作办学基金，加之族中殷实人家个人捐资，致使序贤虽为族学，但保持了相当的教学经费开支。

序贤学堂从此改名“序贤学校”。教材及教学内容全部改新书新学。

父亲随爷爷入序贤学校，插入小学三年级。此时，星姑也已三岁，可爸爸和爷爷除年节假日才回新屋去与奶奶及姑姑们全家团聚外，平时，仍寄宿

在校中，刻苦读书。

在序贤读书的两年，是爸爸以全部稚童之心，接受启蒙灌输之时。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团结、爱国、自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扬的文化与文明，点点滴滴滋润着父亲幼稚的心灵，这可从如今保存完好的作文中看到。

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写道：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智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

父亲也许是从小看到奶奶以江南劳动妇女特有的勤劳与贤慧，仅凭爷爷微薄的薪俸和 30 担族田租谷的收入，竟然把五口之家调理得平安清顺之故，尽管爸爸从小随爷爷寄读，但奶奶的勤俭之风却潜移默化于父亲的意识中。他在作文《家风尚勤俭》中写道：

吾常见能勤俭者可以致富，不勤俭者

亦贫。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亦难矣。

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勤俭持家”推及到勤俭救国。他接着写道：

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而外侮因之以起，各学校或城市中多设有储金救国会。吾人凡妄费用之钱辄储之以救国，此两利之益也。

在没有读到父亲儿时作文时，在同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已经深深感到他是个很讲团结的人，在处理儿时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中，特别是他在分配给弟弟、妹妹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时，总是不辞辛苦地先做思想工作。有一年为让年仅 8 岁的弟弟远远将自己的旧自行车让给小姐姐远芳骑，他在莫斯科养病期间，曾不远万里付信叮咛。这些，我原以为只是父亲对待子女的做法，看了父亲 11 岁时的作文，我才知道，注重团结是父亲少年时“合群”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他认为：

国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

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中国有四万万之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父亲视团结为富民之根，强国之本，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战胜日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团结。不能说这没有一定的道理。

父亲读序贤时，正值他祖父的小弟弟鼎筵公在家乡任教，很喜欢这个侄孙子，常给他讲述历代英雄故事。鼎筵公青年时代曾随清代名将左宗棠远离江南水乡西征新疆，讨伐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匪帮，穿过漫漫千里黄沙路，大破匪帮，立下军功。鼎筵公文武兼资，文学功底很深，左宗棠很器重，此后几年留在身边作文书。中法战争爆发后，鼎筵公又随军血战广西镇南关和越南谅山，荣立战功而获御匾《光照壁水》。这御匾曾高悬在“新屋”正厅门额上。身边生动的爱国故事，潜移默化于父亲的幼小心灵。他在作文中写道：

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

那么，无战事时又何以爱国呢？父亲认为“现今吾国与外国交涉宜提倡国货，不用外货，亦爱国之一法”。“吾国若一日不买日货，则彼有匮乏之虞。”今天看来，父亲当时的想法未免幼稚，但对从小生活在乡间，活动视野不过唐家桥方圆几十公里之地的不满 10 岁的学童，也称难能可贵了。

由于从小随爷爷离家在外，父亲不可能享受到像其他同龄人在母亲身边生活那样的细微照料，但却培养了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更有益于他自强自立信念的确立。在作文中他清楚地写道：

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作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世上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

正是在这种自立、自强的信念主导下，父亲很小就面对独自在外的求学生活。

1915 年夏，父亲在序贤初小毕业。是留在乡间的高等小学继续求学，还是到县城或省城视野更开阔的学校去读书呢？面对家庭经济日渐拮据的状

况，祖父曾举棋不定，但最终还是渴望儿子尽快成才，决定送儿子去省城长沙投考“名誉优良、规模宏大”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3. 走出塾塘乡

盛夏，烈日灼烤着大地，水乡在蒸腾。黄泥小路蜿蜒向前，穿村过河伸向令人神往的省城。父亲怀着既紧张不安又激动企盼的心情告别了奶奶和姑姑，携带着简单的行囊，跟着爷爷、一步一个脚印地徒步八九十华里，来到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悠久，初为“城南书院”，继为“中路师范学堂”，再名为“第一师范学校”。此时，全校分三部分：师范部、附属高小部、国民教育部（相当于初小）。该校是当时省内自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兼备的建制完善的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是三湘学子向往的学习园地。

父亲考进附属高小部，时年 11 岁。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是父亲学生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走出了塾塘乡，走出了湘阴，步入了社会。父亲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年，大大开

阔了他的视野。这里学习生活的氛围，不但使他学识大增，更加快了他体魄心智的成长与成熟。

当时，正值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精神的孔昭绶二度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的爱国精神集中反映在教育事业中。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国家蒙受的奇耻大辱，他把前任校长提出的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改为以“知耻”二字为校训的中心，贯穿着“公诚勤俭”诸义。1917年5月7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上，他作了长时间的演说，极力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认为：我国历年外交失败，由无战斗实力以为折冲后盾，而世界惟有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有武装可以企和平。这一思想对父亲颇有影响，他在作文《言志》中写道：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试观德国之强者日甚。昔德国亦弱国也，常与法战，累为法所挫，……发明新式枪械，再与法战，大败法军。自是振兴工业，以至今日称雄世界无可下矣。……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

孔昭绶治校非常开明，他主张学生参与校政，成立了学友会，课余时间自己管理自己。师范部学生以毛泽东为首开展了生龙活虎的学生自治活动。毛泽东任总干事，传播先进思想，在长沙学生界、知识界颇有影响。附小也于 1916 年 10 月 21 日成立了学生组织——学艺会。并陆续组织了讲演、美术、音乐、竞球、竞技、拳术等课外文体活动小组。

父亲从小随爷爷常住读校中，因而很快地适应了附小的寄宿生活。面对校中丰富的课余活动，他如鱼得水。一年内，先加入了“以练习语言增加知识”为目的的讲演部，又加入了美术、竞技、竞球、拳术等小组活动。此外，他利用星期天走出学校，或去城内观市景，或到郊外赏自然。

秋春之际是出游的好季节。一秋日，他与学友们游长沙，初至天心阁“面对岳麓湘江而长株铁路绕其侧，舟车草木均可指数”，认为这是“本省第一最胜之地也”；继而于街市听“演说会”，见“男女杂遝而至，有童而髻者，有老而齿豁者，有短褐不完者约而纪之，不下数千人”；又去画店赏画。一幅画深深吸引了父亲，“淡墨数笔，写侧势远山半角，具有凌虚缥缈之态”，善喜丹青的父亲，爱不释手，“展玩久之，本甚羡慕，或问价，曰百金，